

九七思前想後

余英時

中國選擇1997年收回香港，這便是承認了1898年的租約是合法的，也便等於承認在今年6月30日以前中國一直自甘居於喪權辱國的地位。這是中國人因無知而為帝國主義塗脂抹粉的一個最可悲的例子。九七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會不會改變呢？我認為，由於中共本身已走上了「資本家化」的不歸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確是安全的。通常我們提到「一國兩制」時，不免有一種幻覺，好像「兩制」是處於平等、平衡的地位，但香港的「制」是暫時依附在大陸的「制」之下的。從7月1日起，香港的前途從此將寄託在大陸的前途之上。

上：思前篇

香港回歸中國是長期以來中國人的共同願望。1945年1月太平洋學會在美國維琴尼亞州的溫泉開會，當時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張忠絨便說明香港是中國的土地，最後必須歸還中國。他盼望英國能一本戰時合作的精神，早日與中國政府商談歸還的具體辦法。英國代表起而抗議，因此展開了一場激辯。事後中國代表團團長蔣夢麟，代表吳文藻、葉公超等都一致表示支持張忠絨的立場。這個代表團是官方派遣的，由此可見當時朝野對於收回香港的問題早已有共識，不過在戰爭未終結以前，一時尚無暇也無力付諸行動而已^①。

1949年中共奪得政權的時候，本可以一舉而收復香港，但也由於外交和經濟上的種種利害計算，而錯過了時機。80年代時如果不是英國人拘泥於新界租界期限的法律條文而提出續約問題，香港的回歸也許還要拖延下去，但問題一經正式提出，中共便不得不把收回香港提上議事的日程了。

我追溯這一段經過，是要說明香港在今年7月1日回歸中國這件事是由許多客觀的甚至偶然的因素所共同構成的。民族主義的原則雖然是背後的基本

動力——即中國人長期以來的共同願望——但它在這件事的具體實現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生直接的作用。如果民族主義真是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上的最高行動原則，超過任何其他一切的考慮，那麼收回香港決不應遲至今天，尤其不應該以1997為交接之年。為甚麼呢？自孫中山革命以來，中國人便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列為爭取國家獨立的主要目標。舉凡清朝與列強所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協定，在1912年以後都已失去了合法性。中國選擇甚麼時候收回香港自然可以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但決不能以清朝所訂立的辱國條約和協定為合法的基礎。九龍、新界的租借發生在1898年，到今年期滿。現在交接之年恰恰訂在1997年，這便是承認1898年的租約是合法的。承認了這一點便等於承認在今年6月30日以前中國一直自甘居於喪權辱國的地位。否則早一年或遲一年均無不可，為甚麼一定要遵守99年的協定呢？也許有人會說，香港島本身是1842年通過《江寧條約》而割讓給英國的，現在中國收回的是整個香港，不僅是新界、九龍，這還不夠證明中共政權反對殖民主義是十分堅決的嗎？但是這裏發生了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果真如此，則中共更不應該接受「1997」這個年份。一方面承認1898年中英租界協定的合法性，一方面又否定1842年《江寧條約》的有效性，此之謂進退失據。倘使中共確以消滅中國國土上一切具有殖民地性質的殘餘恥辱為最優先的考慮，那麼它在1949年以後的任何時間內都可以採取行動，不必偏偏要等到1997這個象徵恥辱的年份。印度在1961年不惜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破裂，而以武力收回了葡萄牙在印度西海岸的戈牙(Goya)殖民地，那才是民族主義精神的真實表現。中共在二十世紀80年代和英國交涉竟仍舊墮入老謀深算的老帝國主義所設下的陷阱，真令人不免啼笑皆非。我們可以斷言，將來英國史家筆下寫香港得而復失的經過，必然強調英國從佔領香港到退出香港都是合法而來、合法而去的。這是中國人因無知而為帝國主義塗脂抹粉的一個最可悲的例子。

第二、第二次大戰以後，歐洲勢力的衰落是一個最顯著的現象。亞洲和非洲各殖民地人民的普遍抗爭逼得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一個個從這些地區撤退。以亞洲而言，英國之於印度、法國之於越南和荷蘭之於印尼尤其是最明顯的例子。從1945年到1960年總共有40個國家擺脫了殖民地的統治，獲得了獨立的地位，總人數在8億左右，佔當時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從此以後，取消殖民地(decolonization)已成為聯合國共同接受的基本原則。英國最善於見風轉舵，早就不斷推動它在亞、非地區的殖民地走向獨立。這並不是強盜忽發善心，而是它眼見大勢已去，不如變被動為主動，事先作好獨立的安排，以圖延長它在這些舊殖民地的影響。1972年，聯合國發起了「取消殖民地」的號召，擬好了一個正式變殖民地為獨立國家的名單。在英屬殖民地中除非洲的Rhodesia和Bechuanaland之外，亞洲的香港也赫然名列其間。可見英國政府見機甚早，25年前已準備改換香港的國際身分。但由於剛剛加入聯合國的中共施加了重大的壓力，英國最後不得不悄悄地把香港從名單中剔除了^②。英國此舉當時對香港人民是保密的，因此鮮為人知。但中共是深知底蘊的，也竟然不動聲色，更不曾乘

機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尤令人無從索解。所以1979年港督麥理浩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最初向北京試探續約的可能性時，英國政府大概鑒於1972年中共的曖昧態度，不免存有僥倖的心理。但他們完全不懂得中共的一貫作風和中古禪宗大師教門徒的心理一樣，其關鍵只在「不說破」三個字。正式通過法律途徑商談續約的便是「說破」了，一「說破」中共便只有帶上另一副面具與世人相見了。但中共明知英國在1972年便已有改變香港殖民地的身分的動議，然而仍然要將收回香港的日期定於1997年，無論如何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中，我們只能獲得一個最近情理的假定：中共對於收回香港一事自始至終並無成竹在胸，所以一直表現出一種猶疑不定、能拖則拖的態度^③。「香港回歸祖國」今天已被渲染成全中國無上榮耀的大事，而一年以來，「1997年7月1日」更被說成中國人天天盼望的「大喜的日子」。從長期的歷史發展來看，這些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但後世讀史者恐怕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個疑問：為甚麼這樣一種關繫着民族榮辱的大事，中國方面從來沒有主動地爭取過，一直要等到英方提出續約的要求時才作出回應，而「回歸」的日期不遲不早，一定要選在99年辱國協定期滿的1997年呢？

下：想後篇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以後的前景究竟如何？這個問題十幾年來不斷有人提出，也一再有人給予種種不同的回答。但在我來說，這屬於預測性質，所涉及的未來變數太多，根本不能有確定的答案。我現在所能做的只是選出目前已知的若干比較重要的因素，略加分析，使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得出自己的結論。

第一，關於「一國兩制」。這是一個意義模糊的概念。根據中共最初的正式文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其涵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但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對香港《基本法》則表示下面四點意見：一、宜粗不宜細；二、不搞「三權分立」；三、不搞普選；四、對特別行政區，中央要管一點^④。這兩個不同的版本自然都是鄧小平一個人決定的，前者是原則性的概括，後者是具體的實施。兩者相較，便可見後者基本上掏空了前者的字面意義。別的不說，只要「中央要管一點」這一句「但書」便可使「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黯然失色。後來由於所謂「本子風波」，更發生了「50年不變」從哪一「年」算起的問題。

通常我們提到「一國兩制」時，不免有一種幻覺，好像「兩制」是處於平等、平衡的地位。但稍一沉思，便不難發現，香港的「制」是暫時依附在大陸的「制」之下的，正如《基本法》不過是中共憲法中的一個臨時「附件」而已。如果「中央」還可以隨時「管一點」，那麼香港這「制」的脆弱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今年4月中我在德國，已讀到了歐洲英文報紙上關於香港原有的「公民自由」已正式為即將上任的特區行政長官，通過一種「立法程序」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歐洲報紙對此給予了顯著的報導。回到美國以後，報紙和電視更有深入的採訪和分析。現在看來已成定局，即集會遊行、反對黨活動以至對中共的批評等自由，在7月1日以後或將不復存在，或將受到嚴格的限制。凡是對於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稍有認識的人，對於這些變化是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的。鄧小平當初雖有收回後香港報紙還可繼續「罵共產黨」的諾言，但這終究只是他個人的興到之語，在法律上毫無根據。現在鄧小平已死，此言已無人負責。何況從毛澤東開始，中共領導人的「諾言」，其性質久已為世所知，因此大概也不會有誰傻到一種程度，竟把它當真。事實上，早在1990年初，江澤民已關照即將赴任的新華社社長，要他改變香港的反共輿論，意即控制香港的言論自由^⑤。這在香港收回之前是不可能完全辦到的，但今年7月1日以後必可逐步實現。從最近香港言論界所表現的「自律」傾向來看，今後香港文化和新聞界的生態勢將全面改觀。這一點似乎已沒有懷疑的餘地。

第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會不會改變呢？這要看我們對「資本主義」怎樣下界說 (definition) 而定。就目前大陸的發展傾向說，中共大概不會像1949年以後對待當時「民族資本家」那樣，在兩三年內便沒收其資產，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這不是由於有「50年不變」那句不值錢的書面保證，而是由於中共黨內上上下下都已嚐到了「錢」的甜味，而且許多高幹本人及其子女也已響應了鄧小平的號召，變成「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了。1979年鄧小平「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那句名言，當時似乎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但這十幾年的對外「開放」，特別是1992年「商業潮」興起以後，私營企業的空前活躍已基本上改變了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香港的「投資者」已看出這一趨勢不大可能逆轉了。

中共自80年代初即通過香港的新華社向本地的「富豪」進行全面統戰，而香港工商界越是有錢的人便越願意和中共合作。他們眼看着政治主人即將從倫敦換為北京，在「唯利是圖」的最高原則下，自然逐漸倒向中共。在中共的最初設想中，它必須取得香港社會上最有勢力的人的支持才能站得住腳，因此也打定主意先建立一個以「大資本家」為基礎的香港政權，而香港的「大資本家」當然也必須依靠中共的政治力量來阻止中、下層市民的民主要求。因為一旦中、下層人民在民主選舉中取得多數，提高稅率、工資和實施大幅度的社會福利政策，這些大資本家的利潤便要受到嚴重的傷害了。在這種情形下，雙方自然一拍即合。1992年商業潮以來，大陸上「先富起來」的階級和香港「早已富了起來」的階級更如水乳交融，今天香港即將登台的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便是這樣形成的。香港的「大資本家」根本沒有「民主」、「自由」之類的問題；他們既不會遊行、集會，更沒有甚麼特別的「思想」和「言論」需要「自由表達」。他們今後的唯一問題是怎樣取得北京新主人的寵信，增加自己在市場上運作的力量。早在80年代中共的新華社已特別運用政治勢力解救某些「親中」的大資本家的困難，故當時已有「政治救火隊」的稱號，並且引起「違背自由市場規律，可能對自由

市場起破壞作用」的批評^⑥。但這還是出於「公」的考慮，至於「講關係」、「走後門」之類的「私」的活動，更是難以估計。後一類的活動在「回歸」後必然日益猖獗，則是斷言的。

總之，由於中共本身已走上了「資本家化」的不歸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確是安全的。至於香港原有的自由市場是不是還能保持它的「自由」性質，則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今天中共不但在大陸、香港專門和「大資本家」結成親密盟友，即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是如此。以美國而論，今天為中共在白宮游說的正是政界和企業界的主流力量。以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為首的一個組織包括了四個卸任國務卿和五六個卸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顧問，他們的後面則是無數規模最大的跨國公司。正是這一群人，為了擠進大陸的市場，全力以赴為中共爭取最惠國待遇，呼籲美國政府必須放棄一切「人權」的要求，以改善「中美關係」^⑦。相反地，從「人權」立場上批評中共政權的力量則主要是新聞界、學術界、文化界及一般知識份子。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來說，他們不折不扣地屬於中、下層階級。而中共在美國的「盟友」則恰恰是「帝國主義霸權」的核心力量。總之，中共的支持者今天普遍是「大資本家」，這些人和中共一樣怕中國大陸發生任何「動亂」，因此也以「穩定」為最高的價值。所以我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未來是安全的。

自鄧小平「經濟放鬆，政治加緊」的政策出世以來，中共近二十年都一直嚴格遵行着，並且越走越遠。最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的一位專欄作家曾指出：中共今天實踐的已不再是馬列主義 (Marxism-Leninism) 而是市場列寧主義 (Market-Leninism)。這句話不但妙不可言，而且一針見血。但這樣一來，中共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就分家了，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國兩制」。現在中共正在把這個「一國兩制」推行到即將回歸的香港。這也可以說中共忠實地履行了對香港的承諾。從7月1日起，香港的命運即將永遠和大陸的命運連為一體，香港的前途從此將寄託在大陸的前途之上。這是斷言的。

註釋

① 見張忠絃：《迷惘集》(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68)，頁173-74。

② 可看Paul Theroux, "Letter from Hong Kong: Ghost Stories", *The New Yorker* (May 12, 1997): 56.

③④⑤⑥ 可參看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香港：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1993)，頁82-83；151-52；229；131。

⑦ 詳細資料見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7), ch. 4。